

对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思考

王晋斌

内容提要：观点 1：80 年代以来三大需求拉动 GDP 增长的历史轨迹表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总体上呈现出高波动风险态势下的出口促增长的特征，并在 2005-2007 年进入了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基本实现了“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 GDP 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其他阶段内需和外需之间的替代都带来了 GDP 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的高波动风险，这充分表明国内的生产与国内消费结构不能很好匹配。

观点 2、要充分明确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被动调整时期，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的惰性，不可能简单采取内需来替代外部需求的发展路径。如果简单、盲目倡导以内需替代外部需求，结构性的剧烈变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在国内经济新增长极尚需要培育和发展的时期，会导致结构性的恶化和经济更大的波动。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观点 3、尽管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苏的不确定性、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 年）难以重现 2005-2007 年的“黄金期”，但由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有竞争力，保证既有的分工格局的带来的优势是保证未来主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成功的必要条件。

观点 4、在平衡发展的路径下，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深化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现有的出口退税政策和人民币币值来确保一般贸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与此同时，需要加大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一、导言

出口促增长的起点是外部需求决定的，在国内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靠外部需求来拉动国内的供给，并产生出口—国内投资联动机制。与此同时，在出口偏向政策的激励下，随着国际市场的逐步开拓，进口技术和规模经济带来成本的减低，从而供给反过来推动出口的增长，实现出口——国内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循环。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按照上述逻辑逐步完成了通过外向型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到依靠进口技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培育的规模经济和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条件形成的自发的比较优势这一转变，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越来越强的专业化分工格局（王晋斌，李南，2007）。至今，中国经济出口促增长的模式被誉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典范，但在当下受到了挑战。受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 1-6 月净出口对 GDP 的拉动率为 -2.9%。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重新看待中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本文认为，未来中期（3-5 年）中国经济不可能再现 2005-2007 年出现的出口促增长发展模式的“黄金期”，但由于过去多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拉动作用的惯性，内需无法简单替代外需，需要平衡内需和外需两个经济增长支点之间的关系——在以改革促内需的同时，进一步发掘能够扩展外需的新增长点。任何单一支点，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本文分四部分来论证上述结论。第二部分分析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特点；第三部分论证未来中期（3-5 年）出口促增长的上界；第四部分讨论平衡内外需的关系以及如何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最后一部分是简要结论。

二、出口促增长：高波动下的增长

80 年代以来三大需求拉动 GDP 增长的历史轨迹表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总体上呈现出高波动风险态势下的出口促增长的特征，并在 2005-2007 年进入了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外需对 GDP 的拉动率高且波动小。但由于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下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几乎是“一夜之间”失去了依靠出口促增长的经济增长动力。

图 1 和图 2 显示，出口能够弥补内需不足的实质性阶段开始于 1994 年，从

1994 年开始，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基本处于正值。1997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达到了 44.4% 和 4.2%。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中国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1997 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为 9.3%，这表明 GDP 增长率中的约 45% 是依靠出口拉动的，这是历史的最高点。在 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明显下降，一直到 2001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别下降到 -0.1% 和 0%。2001 年随着中国经济加入 WTO，外需再次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也因此进入 2005-2007 年依靠外需促增长的“黄金期”。这一期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达到 21.03% 和 2.33%，而波动性（标准差）仅有 2.663 和 0.153，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率高达 7.90% 和 15.22%。而从 1980-2008 年的情况来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年均值则为 8.84% 和 0.51%，而波动性（标准差）高达 23.33% 和 2.56%，整体上呈现出高波动风险态势下的出口促增长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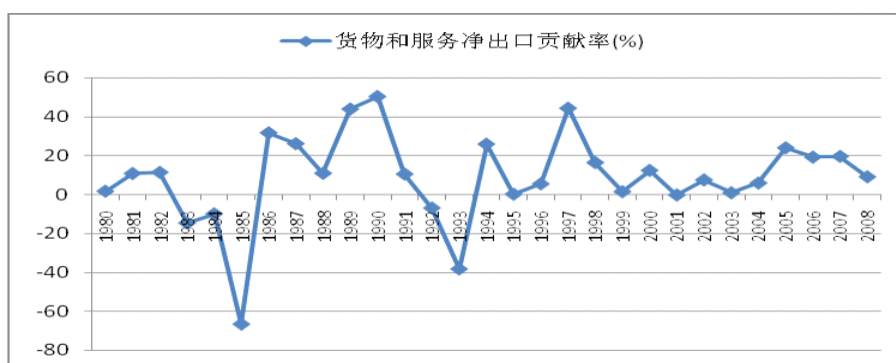


图 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 (%)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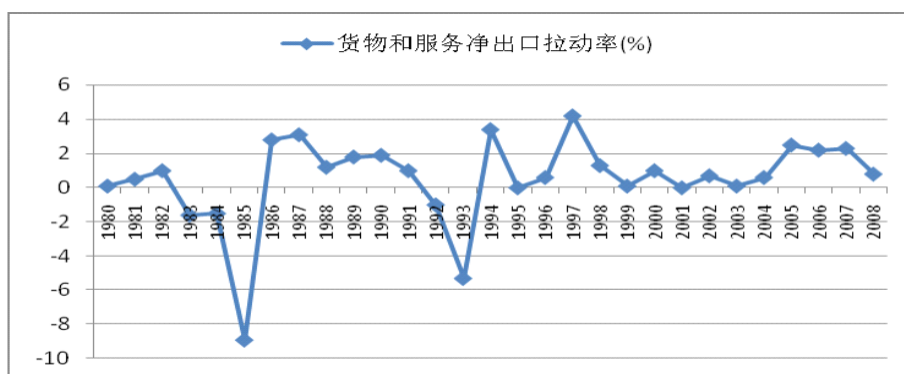


图 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 GDP 拉动率 (%)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绘制。

从不同阶段的情况来看，为了扩大外部需求，从 1984 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措施来促进出

口。从 1992 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进口（尤其是 FDI 所需要的进口品）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在 1994 年之后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95 年开始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在 2001 年进入 WTO 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1995-2001 年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和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之和为 1886.95 亿美元，而 2002-2008 年间这一数额达到 9247.55 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约 5 倍。表 1 的数据显示，在这三个不同阶段中，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均值都在不断上升，而波动性在下降。只有这一时期，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单位波动风险带来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突破了 1%，分别达到 1.45% 和 1.34%，出口促增长的发展战略进入了单位“收益”超过单位波动性的高回报期。

表 1 不同阶段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的均值和波动性（标准差）

	1984-1994	1995-2001	2002-2008
贡献率均值 (%)	7.17	11.54	12.41
贡献率的波动性	35.38	15.82	8.58
拉动率均值 (%)	-0.14	1.03	1.31
拉动率的波动性	3.86	1.49	0.98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在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入 2005-2007 年的“黄金期”时，2008 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的深度下滑。2009 年 1-6 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 9461.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3.5%。其中：出口 5215.3 亿美元，下降 21.8%；进口 4246 亿美元，下降 25.4%^①，进口额和出口额基本与 2007 年 1-6 月的水平相当，但由于增速的大幅度下滑，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和拉动率也急剧下降。2007 年分别为 19.7% 和 2.3%，2008 年两者只有 9.2% 和 0.8%，而 2009 年 1-6 月份净出口对 GDP 的拉动率则为 -2.9%。中国经济几乎是“一夜之间”失去了依靠出口促增长的经济增长动力。

三、出口促增长：未来中期的上界

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

^① 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公布的《2009 年 6 月进出口简要情况》，2009 年 7 月 14 日。

苏的不确定性、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 2005-2007 年的“黄金期”，出口促增长的发展模式的潜力受到了明显的约束。

尽管 2009 年 1-6 月进口额和出口额基本与 2007 年 1-6 月的“黄金期”水平相当。但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 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 2005-2007 年的“黄金期”。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五个原因：

（一）、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制约外部需求的空间。

美国经济调整外部不平衡的要求必然对世界经济的需求造成显著影响。图 3 显示了 80 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是发生在 1987 年。美国从 1982 年外部出现逆差到 1987 年的外部赤字/GDP 达到 3.39%，经历了 5 年的时间，而这一次调整也巧合性地经历了 5 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全球不平衡的调整主要发生在美日之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美国赤字的 33.5%，调整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日元对美元升值的货币调整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时期，日本贸易顺差下降与美国贸易逆差的降低是相伴的，美国的贸易赤字/GDP 由 1987 年的 3.39% 下降到 1990 年的 1.36%，并在 1991 年实现了外贸略有盈余；而日本的贸易盈余/GDP 则由 80 年代最高点 1986 年 4.26% 下降到 1990 年的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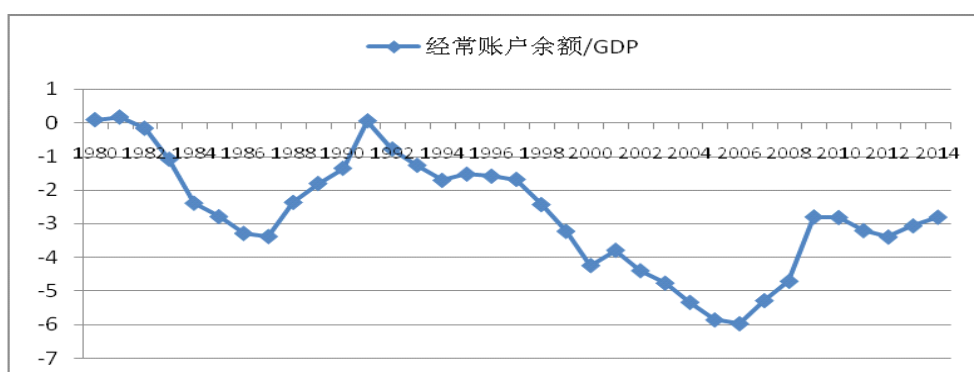


图 3 美国经常账户余额/GDP (%) 变化趋势：1980-2014。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 IMF 的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09) 数据库的数据绘制。2009 年之后是预测值。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 2006 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GDP 达到 5.98%。从 1992 年美国外部出现逆差开始到 2006 年经历了 15 年的时间。在美元贬值的驱动和金

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调整的速度较快。伴随着 GDP 的大幅下滑和进口的大幅下降（2009Q1 比 2008Q4 货物进口下降了 548 亿美元，降幅达 30.6%）^②，美国经常账户赤字/GDP 由 2008 年的 4.4% 快速下降到 2009 年第一季度的 2.9%。但按照 IMF（2009）的预测，即使到 2014 年美国的外部赤字/GDP 也有 2.82%。如果按照这样的调整速度，可以预计的是美国要实现外部基本平衡需要 10 年左右的时间。这主要是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下滑阶段、服务贸易对于纠正美国贸易赤字的作用没有明显提升以及全球盈余国家的多元化导致的调整对象的分散化所致，当然这也与美国经济主观能够承受的外部不平衡程度有关。从欧盟的外部不平衡来看，欧盟从 2005 外部开始出现赤字，贸易赤字/GDP 为 0.093%，到 2009 年将达到 1.331%，即使到 2014 年也有 0.229%。考虑到 2007-2008 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中的 40% 以上的份额是中美贸易导致的（图 4），中美之间的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按照这一比例进行粗略的估计，美国的逆差减少 1%，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美国净外部需求下降 0.4%；进一步考虑到 2007-2008 年中国对美国净出口占总净出口的比例和净出口的拉动率分别约 60% 和 1.5%，为那么美国外部不平衡下降 1%，中国净出口对 GDP 的拉动率将下降 0.36%。因此，美国和欧洲经济外部不平衡将在未来 3-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约束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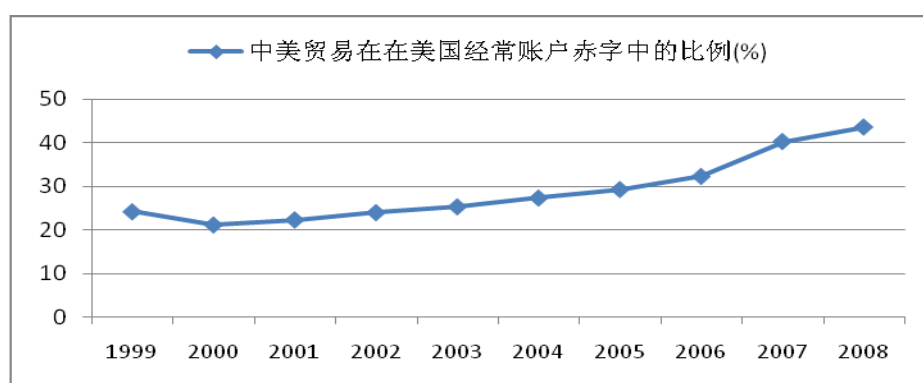


图 4 中美贸易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中所占的比例：1999-2008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 BE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s 中的 Table 1.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和 Table 12. 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by Area - China 中的数据绘制。

（二）、中国货物出口地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制约外部需求增长的潜力。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下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以及一些重要的新

^② 数据来源：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First Quarter 2009, BEA, June 17, 2009.

兴经济体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表2 归纳了中国经济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未来三年（2009-2011 年）和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 年）经济增长的对比变化。2005-2007 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额的约 85%，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决定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潜力。

表2 中国经济主要出口地经济增长的变化（%）

	发达经济体	欧元区	美国	日本	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	亚洲5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2005-2007	2.77	2.44	2.56	2.12	5.35	5.90	9.45	4.47	7.54
2009-2011	-0.51	-1.26	0.23	-0.21	-0.47	2.22	5.68	1.13	-1.17

注：（1）发达经济体包括全球最发达的 33 个国家和地区；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地区和台湾；亚洲 5 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2）2005-2007 年和 2009-2011 年的增长率均为上一年的 GDP 的加权平均值，作者依据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9) 的原始数据计算得到，2009 年后的数据均为 IMF 的预测值。

一些近期相关研究，如 C. Akin and M. A. Kose (2007) 的研究表明，在 80 年代中期之后，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传递效应在下降，但传递效应仍是明显的：对新兴国家的溢出效应为 35%，对更多依靠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传递效应为 45%。L. Crane, M. A. Crowley, and S. Quayyum (2007) 综合了现有的研究，发现美国进口的收入弹性为 1.51-2.29，价格弹性为 -0.31-1.45。按照 IMF (2009) 的预测，美国经济要到 2011 年才能达到 2005 年约 3% 的增长水平，因此，受制于外部不平衡的压力，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拉动作用要在两年之后也难以出现像 2005-2007 年那样的情况。另一项近期的研究 (J. Aziz and Xiang ming Li, 2007) 表明，外部需求下降 1%，中国的出口将会下降 4.5%，带来 GDP 下降 0.75%；而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价格弹性在 2000-2006 年约为 -2%。对比外部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而且由于收入弹性和 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所谓的“45°规则” (Krugman, 1989) ——收入弹性与增长率之间系统相关。那么主要经济体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 3-5 年制约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主要因素。

（三）、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逐步界定了中国出口品的国际市场容量。

为了扩大外部需求，从 1984 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措施来促进出口。从 1992 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资

本品的进口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并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环节，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集中度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1980 年出口品的集中度为 0.168，1990 年为 0.193，1997 年为 0.256，2008 年达到 0.303。此外，Amiti and Freund(2007)的研究也表明，出口份额中排名前 70 名的 Gini 系数由 1992 年的 0.46 上升到 2005 年的 0.55，而排名前 100 名产品的 Gini 系数由 1992 年的 0.35 上升到 2005 年的 0.50，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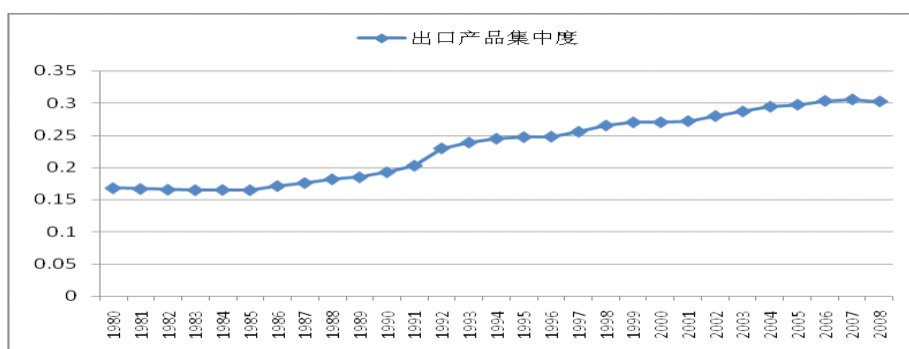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出口产品的集中度（赫菲达尔指数）：1980-2008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绘制。商品分类别采用了 SITC 分类。

从具体的产品类别来看，1980 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分别为 24.85% 和 2.33%，1995 年两者分别为 42.78% 和 10.55%，而到了 2007 年分别达到历史高点，分别为 47.47% 和 23.69%，2008 年两者略有下降，但两者仍然占据了中国总出口额的约 71%。

出口的专业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意味着特定的市场容量。因此，给定全球市场的容量，出口产品的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界定了中国出口增长的空间。

（四）、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的空间。

1985 年以来的以出口退税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外需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 年出口退税占出口额的 2.43%，1995 年上升到 4.41%，后受到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在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 年达到了 5.53%。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这意味着大约提高了出口企业 5.53% 的利润率。

从出口退税占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来看，波动比较大，2005-2007 年期间

这一比例高达 28.7%（图 5）。考虑到同期增值税和消费税占到税收总体收入的 41.0%，因此，进一步扩大出口退税的空间极为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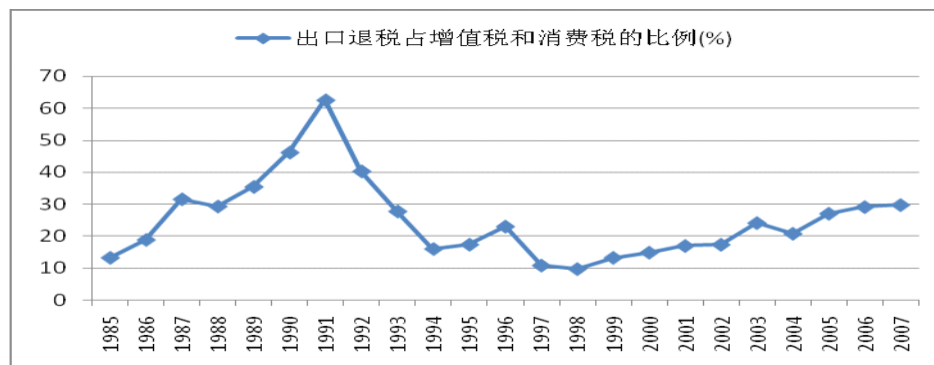


图 5 出口退税占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 (%)：1985-2007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国泰君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的数据计算绘制。

出口退税无疑会起到激励企业出口的作用，但由于出口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波动幅度较大，难以确定两者之间的显著关系^③。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当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时，单一的出口退税并不能够有力地阻止出口的下滑。这一点在 1998 年和 2008 年两次金融危机时期表露无疑。1998 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出口全年近乎零增长，而 2009 年 1-6 月份同比下降了 21.8%。从出口产品的类别来看，出口退税更难以阻止哪些收入需求弹性大的商品的大幅度下滑。今年 1-6 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 21.2%，机械设备出口下降 18.9%。而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降幅相对小。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下降 8.5%；鞋类出口同比下降 4.3%；家具出口同比下降 9.8%；塑料制品出口同比下降 7.1%；箱包出口同比下降 7%。目前，经过最近连续 7 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在总计 13000 多个税号的出口商品中，已有 1971 个税号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占总量的 15%^④。

因此，从出口退税的空间和作用来看，需要重新审视出口退税换增长的模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的空间，基本走到了极限。

（五）、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升值压力制约了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国进口结构来看，2002 年以来，60-70%的进口品是中间品，而大宗商品进口约占 25%。图 6 显示，受亚洲局部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 年底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基本上是 1992 年以来的最低点。而 2008 年由发达国家和地

^③ 使用 1985-2007 年的出口退税额增长率和出口额增长率（对数形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难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可能是导致这一结论的重要原因。

^④ 资料来源：安邦研究简报，2009 年 7 月 12 日。

区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大幅度下滑也带来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并在 2009M2 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分别见底，但两者与 2005 年的价格相比仅下降了 2.71%和 10.08%；工业投入价格指数在 2009M3 见底，与 2005 年相比下降了 5.32%。3 月份以来，这些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了快速反弹。与 2009M2 的低点相比，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分别上涨 30.27%和 38.14%，而工业投入品的价格指数与 2009M3 的低点相比也上涨了 17.42%。这样的价格变化轨迹表明了大宗商品低价格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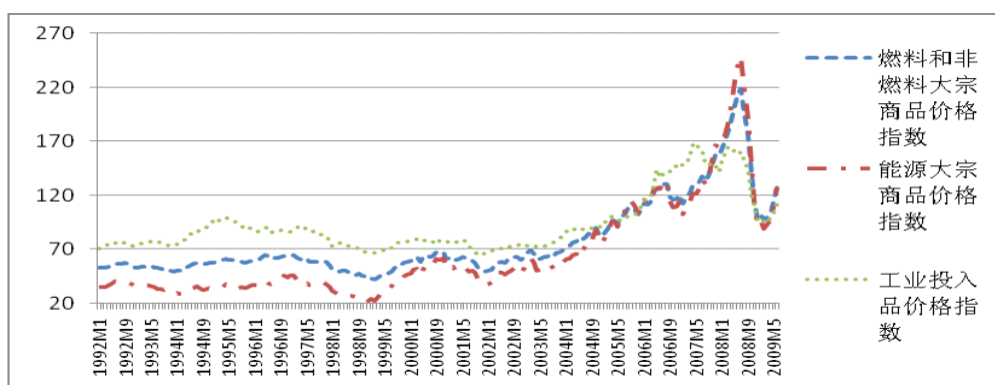


图 6 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的变化：1992M1-2009M6

注：价格指数以 2005 年=100 为基期；能源大宗商品包括原油、天然气和煤。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9) 提供的数据计算绘制。

从国内的劳动成本来看，低工资一直是中国出口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但随着国内劳动收入分配矛盾加剧，1992-2005年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5个多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上升了1个百分点，企业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重的下降，主要原因是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杨天宇，2009）。而未来中长期中内需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改革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无疑会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过去赖以依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不断缩小。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1995—1999年期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但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是不断下降的。依据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统计数据，2000-2007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年均下降1%、3.5%

和2.0%^⑤。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必将进一步缩小。

从人民币汇率来看，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处于上升通道，汇率升值无疑对出口会产生负面影响。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对约占出口品20-25%劳动密集性的制造品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W. Thorbecke and Hanjiang Zhang, 2008）。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对一般贸易的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Marquez and Schindler, 2007; Cheung, Yin-Wong, M. Chinn, and E. Fujii, 2007; 等等）。由于一般贸易的份额呈现上升态势。2002年一般贸易占加工贸易的比例为75.6%，到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1.6%，而2007年达到87.2%，2008年1-10月进一步上升到97.7%，一般贸易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近一半。这一方面说明了制造业国内分工链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出口企业的初级产品供应链中，这将进一步降低出口企业进口初级产品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也说明名义汇率的升值会更大幅度上降低中国出口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外部需求。

（六）、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

美国调整外部不平衡和全球经济下滑和的双重压力下，逆周期的贸易政策将进一步约束中国货物出口的空间。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从2006年美国外部不平衡达到30年以来的最高点开始，2006年11月，美国改变了其二十多年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先例，对中国铜版纸开启了首起反补贴调查。而依据WTO秘书处2009年5月7日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另据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据，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74.42亿美元（2008年全年涉案金额仅6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同时，部分国家提高对中国出口品的进口关税、实施绿色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的贸易保护举措。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尚未出现明显改善和美国外部不平衡调整没有达到其合意的水平时，这种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持续下，出口形势短期中不会得到明显改善。

^⑤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arch 3, 2009),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and Unit Labor Cost Trends 2007, Revised.

四、出口促增长：定位与突破

过去三十年中 GDP 三大拉动因素只有在 2002-2007 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 GDP 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其他阶段内需和外需之间的简单替代都带来了 GDP 和通货膨胀的高波动风险。因此，明确在目前的被动调整时期，确保制造业分工和贸易格局的优势是至关重要的。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深化专业化的潜力，并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一）、确保中国经济中的制造业分工和贸易格局的优势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已形成了以工业制成品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贸易分工模式，而形成这样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则是资源禀赋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形成了制造业的分工基础，而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提升了以劳动密集性的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并通过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并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环节。

1990 年至今加工贸易出口额一直占据总出口额超过 50% 的比例，这与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实行优惠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自 1984 年以来，中国对加工贸易一直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免领进口许可证，加工再出口时免征出口税和免领出口许可证。同时，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各种优惠待遇，主要包括：对外商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减免关税和进口增值税、对三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免二减三等。在国际制造业垂直分工的大背景下，各国处于产品增值链中的不同环节。中国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强化了中国在国际生产链中“组装与加工”的分工，造就了中国“制造工厂”的地位，进而成功地创造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 1980 年的 3.6% 上升到 2006 年的 54.66%，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快速成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最近两年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内外贸一体化带来

的规模经济和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制造业国内分工链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出口企业的初级产品供应链中，集中体现在一般贸易出口占总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2007年加工贸易出口仍占据出口总额的50.7%，一般贸易出口的比例为44.2%；2008年1-10月加工贸易出口的比例下降至47.5%，一般贸易出口的比例上升至46.4%。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几乎平分秋色。

依据 WTO2006 年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1980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 0.8%，1990 年为 1.9%，2000 年为 4.7%，而 2005 年就比 2000 年翻一番还多，达到 9.6%，仅次于美国的 10% 和 EU(25) 的 44.3%；而在总量上，中国出口目前已占世界出口份额的近 10%。而依据 WTO2008 年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2007 年整个亚洲地区制造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例高达 81.6%，显著高于全球 69.8% 的比例。因此，制造业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多年悉心培育和发展的结果，也是区域性的国际化分工的结果。这也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未来数年，中国经济的内部需求也无法替代如此巨大的外部需求。

(二)、出口与内需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平衡关系。

在过去近三十年的 GDP 拉动因素结构的分解中可以看出，GDP 三大拉动因素呈现出波动中维持增长的格局（图 7）。进一步看不同的增长阶段，1994 年前后三大因素在拉动 GDP 增长中的作用的变化轨迹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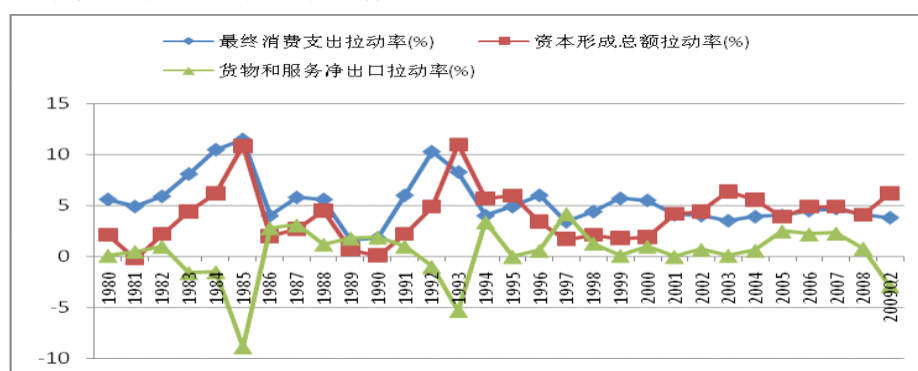


图 7 中国经济中三大需求对 GDP 拉动率 (%)：1980-2009Q2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绘制；其中 2009Q2 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3 给出的不同阶段的数据可以看出：(1) 在 1982-85 年和 1991-93 年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负的两个时期，中国经济在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之间替代的过程中呈现出 GDP 和 CPI 的高增长和高波动；而在净出口拉动率由正转为 0 的 1994-2001 年期间，GDP 和 CPI 依然呈现出高增长和高波动。(2) 尽管 GDP 三大拉动因

素从未在连续两年出现过同步变化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波动，但在 2002-2007 年这一时期基本实现了所谓的“三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在这一时期 GDP 维持高增长、低波动以及物价水平处于合意范围，且波动小。物价比价平稳的原因除了货币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需吸收了国内物价上涨的部分动能。(3) 2008-2009Q2GDP 拉动率的构成中出现了净出口和消费两者下降，而只有投资拉动率上升的格局。这表明近期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由过去当外部需求为负拉动率时的投资、消费“两驾马车齐奔”的局面变为投资“单骑救主”的格局，2009 年 1-6 月投资拉动率占 GDP 的 87.3%，是过去三十年的最高点。对比净出口拉动率的两个历史低点 1985 的-8.9%和 1993 年的-5.3%时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两年消费拉动率分别高达 11.5%和 8.3%。

表 3 不同阶段中国经济三大需求拉动率、CPI 的变化以及 GDP 增速

	1982-1985	1991-1993	1994-2001	2002-2007	2008-09Q2
净出口 拉率	1% 下降至 - 8.9%	1% 下降至 - 5.3%	由 3.4% 变化 至 0%	由 0.7% 变化 至 2.3%	0.8% 下降至 - 2.9%
消费拉 动率	5.9% 上升至 11.5%	6% 上升 至 8.3%	由 4% 变化至 4.1%	由 4% 变化至 4.7%	4.1% 下降至 3.8%
投资拉 动率	2.2% 上升至 10.9%	2.2% 上升至 11%	由 5.7% 变化 至 4.2%	由 4.4% 变化 至 4.9%	4.1% 上升至 6.2%
CPI	2% 上升 至 9.3%; (3.55)	3.4% 上升 至 14.7%;(5.85)	24.1% 变化至 0.7%; (9.45)	由 -0.4% 变化 至 4.8% ; (2.01)	5.9% 下降至 - 1.1%
GDP 年简 单平均 增长率	13.2% (2.71)	12.5% (2.83)	11.2% (1.86)	10.5% (1.05)	8.1%

注：(1) 不同阶段划分方法：依据净出口对 GDP 拉动率在由正转负划分出三个时期以便进行对比。三个时期分别是：1982-1985、1991-1993 和 2008-2009Q2；其余两个时期是按照加入 WTO 前后进行了划分。2009 年 Q2 的数据简单以年为单位计算。(2) 括号中的数据为波动性（标准差）。(3)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依据历史经验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投资拉动具有供给管理的特征，在外部需求无法吸收供给的潜能时，消费需求的吸收必将带来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通货膨胀的快速上升。而当外部需求上升时，供给管理推动通货膨胀上升的能量部分被外部吸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减缓。从这一点上来看，只有 2002-2007 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真正实现了出口促增长、出口缓和通胀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的要旨。这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需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看，今年 1-6 月份投资需求“单骑救主”的格局对于确保 GDP 一定的增速是必需的。但要缓和这种供给型管理的特征带来的未来通货膨胀压力，需要在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积极创造出口需求的新增长点，平衡内需与外需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替代。因此，需要加快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拓展消费在 GDP 中的拉动力，来防止投资需求“单骑救主”格局带来的结构性恶化。

（三）、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深化专业化的潜力。

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 FDI 的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中国企业技术的升级。对外表现为高新技术出口/比例从先进国家或地区引进 FDI 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都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相比 2007 年发展中国家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产品出口中占 19%，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占工业制成品的 30.1%。中国已成为高技术产品的大进口国和输出国。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中高技术出口的比例从 2004 年以来没有变化，基本维持在 30% 左右的水平。在 2005-2007 年的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占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0.5%（由 30.6% 下降到 30.1%）。这一点与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9 年中的数据，2000 年制造业出口的 82% 和增加值的 79% 是高收入国家创造的，2006 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两者的比例依然高达 73% 和 76%。这表明，尽管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出口增速在上升，但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出口大多是低附加值的高技术产品，出现了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扩散的进程中始终处于“有限后发优势”，自主创新不足。

从中国的高技术出口来看，90 年代中期之后，一般贸易出口的高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就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 1996 年的 14.3% 下降到 2003 年的 7.2%，直到 2007 年才上升到“九五”中期的水平。2007 年，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各类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出口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 11.2%，而加工贸易方式占当年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 85.4%。其中进料加工贸易又是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其出口额占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达到 84.9%^⑥。加工贸易在中国

^⑥ 数据来源：<http://www.sts.org.cn/>。

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充分说明了中国出口的大部分高技术产品仅为其他国家的代加工产品，是高新技术中的低附加值产品，这显然是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贸易主体、贸易顺差和逆差上得到进一步验证。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出口和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6.6%和79.4%，而内资企业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占高技术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只有20.5%和13.1%。在贸易差额上，外资企业是贸易顺差的主体，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的贸易顺差高达564.1亿美元。而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是贸易逆差主体，2007年达到123.4亿美元。因此，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总体上是贸易顺差，顺差主体是外资企业，而大部分内资企业仍有较高的贸易逆差。

可见，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快速的学习过程建立一定的技术能力，即通过创造条件来引进、消化并吸收部分国外先进技术，可以将发达国家的创新迅速转化为商品形成挑战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Porter and Opstal, 2001）。但要形成自主性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还必须通过在研发领域和技术人才上的大量投资获得创新能力。依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9年《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公布的最新R&D数据来看，中国R&D/GDP比例1999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上升，2007年达到1.44%，高于同期俄罗斯的1.12%、巴西的1.11%，但与美国、日本以及欧盟国家总体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费用分别是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2007年中国研发人员人均R&D经费比例更低，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而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2007年的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只有25.8%，这一比例远低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40%，韩国的53.8%，也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30%以上的比例。因此，制定恰当的技术创新战略——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战略，特别是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够摆脱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的关键，也是深化专业化优势的关键。

（四）、通过稳定人民币币值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以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出口贸易取得了长足进展。最近几年，中国经济中的进出口/GDP 比例高达 60-70%。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策略和人民币过去十几年的币值稳定性已经为人民币累积了积极的国际声誉，但人民币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一直处于分离态势，人民币没有发挥应有的稳定和扩展贸易的作用。直到最近，人民币在中国的国际贸易结算中作用开始正式启动。2009 年 7 月 6 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首单业务在上海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从边境地区拓展到上海、广州、香港等金融中心城市。从人民币跨境结算正式开启后仅仅两天时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涉及的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金额总量已超过 8000 万人民币。同时，要发挥出口信贷的积极作用。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可以实现多重目标。稳定的币值能够提升人民币参与中国国际贸易结算的功能，使中国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使用人民币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结算。这可以起到三个基本作用：一是贸易结算可以规避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降低外贸企业的美元汇率暴露风险；二是可以降低这些贸易伙伴担心美元外汇储备降低的风险，实现人民币双边、甚至区域贸易与金融政策的融合。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起到扩展贸易的作用。三是减缓中国美元外汇资产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从这三个作用来看，在充分研究贸易伙伴货币币值风险的基础上，人民币应该加大与一些亚洲贸易伙伴和像巴西、智利、南非等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互换。与此同时，应该在中国特定的贸易区域内，如香港地区实行人民币全流通等策略，加快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

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也是缓解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缓解货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确保国内的就业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民币币值稳定和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能够发挥金融促贸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五、简要结论

1、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 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 2005-2007 年的“黄金期”。但由于出口在拉动 GDP 增长和缓冲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作用，因此，不是简单用内需去替代外需，而且内需也无法完全替代外需。平衡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刻意追求的发展模式。

2、稳定现有的出口退税政策，并依靠汇率稳定来确保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一般贸易出口的逐步恢复。保持现有的制造业分工模式的优势至关重要，既可以缓解国内就业的压力，又可以为未来国内经济结构性的调整提供时间和空间。

3、加快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深化专业化的潜力。一方面来缓解劳工成本上升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提高分享全球高技术、高增加值产品出口增长的份额。

4、要加快金融政策与区域贸易政策的融合来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发挥人民币走出去的金融促贸易的战略，以避免和降低双边和区域贸易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降低贸易伙伴对美元储备消耗的担忧，同时减缓中国美元外汇资产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参考文献:

王晋斌，李南，2007，“中国进出口贸易顺差的原因、现状及未来展望”，《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杨天宇，2009，“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效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论坛第一季度，研究报告。

Andrew Hughes Hallett, Christian Richter, 2009, “Economics in the Backyard: How Much Convergence is there between China and her Special Regions?”, *The World Economy*, Volume 32 Issue 6, 819 - 861.

Cheung, Yin-Wong, M. Chinn, and E. Fujii, 2007, “China’s Current Account and Exchange Rate”, in R. Feenstra and Shang-Jin Wei (ed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igdem Akin](#) and M. Ayhan Kose, 2007, “Changing Nature of North-South Linkages: Stylized Facts and Explan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No. 280](#).

Jahangir Aziz and Xiangming Li, 2007, “China’s Changing Trade Elasticities”, *IMF Working Paper*, no. 266.

Krugman, Paul, 1989, “Differences in Income Elasticities and Trends in Real Exchange Rat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3, 1031 - 47.

Leland Crane, Meredith A. Crowley, and Saad Quayyum, 2007,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rade deficits: Trade elasticities of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7.

Marquez, J. and J. Schindler, 2007, “Exchange Ra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 837-53.

Mary Amiti and Cariline Freund, 2007, "An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rade Confer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Hosted by IMF, Washington, DC.

Porter, M.E and Van Opstal, D., 2001, *US competitiveness 2001: Strengths, Vulnerabilities and Long-term Priorities*,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

Willem Thorbecke and Hanjiang Zhang, 2008,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China's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Export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E -038.